

# 决策参考

## Jue ce can kao

第二十六期（总第 276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07 年 5 月下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mailto:zhouyuqi@gmail.com) 13905103528

**编者按：**城市建设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我们在推出“大市区建设”和“中心城市建设”两期之后，现在又推出一期“城市建设”，谈谈城市有关的话题，也对城市这一中心话题作个了结。余秋雨谈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和三个“不在乎”，相信也会引起您的兴趣。“领导科学”一栏推荐一篇“问计于民有学“问”，供各位领导参考。

本刊乐意为您提供定题服务，随刊附《调查表》也等待您的回音。

## 要目

### ●本期专题

城市建设

世博首次汇聚城市范本

铁路提速催生大都市圈形成

深入合作，加速打造深港都市圈

深圳社会工作发力

### ●文化思考

余秋雨：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和三个“不在乎”

### ●领导科学

问计于民有学“问”

## ● 本期专题

### 世博首次汇聚城市范本

#### 热点解读

人口密度很大的巴西城市库里蒂巴，为何能让上班族即使在繁忙的上下班高峰也能用 45 秒坐上公共汽车？尼日利亚城市伊巴丹是如何把屠宰场垃圾变废为宝的；葡萄牙城市目威罗如何用“免费自行车”方式，智慧地解决了汽车拥有量激增导致的城市污染和拥堵问题……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效果图

“城市最佳实践区”，这个首次出现在世博会历史上的名词，成为让国际展览局充满期待、让上海世博人应对挑战的一项重大内容。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认为：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创新，在世博会历史上首次引入一个全新的参与者——城市。

城市，如果成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特殊展品，会是怎样一幅的场景呢？

5 月 14 日，这个 3 年后最富有想象力、值得期待的世博会的挑战和亮点——城市最佳实践区，由组委会正式向全球城市抛去绣球。

#### 一例令人兴奋的创举

### 3年后上海汇聚“城市展品”

4月25日—26日，位于浦东新区的浦东南路3588号的世博大厦13楼里的一间会议室，几乎成了一次小型的“联合国会议”。

在此召开的是“城市最佳实践区”国际遴选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与会的18位委员，是分别来自联合国人居署，环境规划署、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的官员们。

会议“成果重大”。从5月14日起，城市参展自荐案例集公告文本除在上海世博会唯一官方网站上公布外，所有国际遴选委员会的成员机构允诺在其各自官网公布，以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发出邀请。

如此速度和力度，让上海世博人备受鼓舞。

事实上，在当初申博初期，中国决定首次给世博会增添一个新的主题元素——“城市”时，城市要作为一个“展品”的想法，就应运而生了。

不过，当时的“展品”设想远没有今天这么大，仅仅只是想展示实验室里的有关城市发展和管理的研究成果。直到去年12月1日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在中国展览局提交的注册报告中，还叫做“城市最佳实验区”。

但显然，日益严重的“城市病”，使国际社会也日益感到直面与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城市究竟该如何提高生活质量，已不止于“实验性”，而是迫不接待的需要“实践性”——集全球城市之智慧，把已领先一步创造的有价值的、公认的一些优秀实践方案和实物展示出来，运用、推广、启迪到更多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中。

“城市最佳实验区”因此变成“城市最佳实践区”。而在上海世博园浦西的一块15公顷范围内，辟出一个面积只占3%的、但影响可能却是最大的“城市特区”。

### 一个众人关注的焦点

#### “最佳”城市案例从哪里来

眼下的周汉民，恐怕又要添一个雅号：“城市实践专家”。

这位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城市最佳实践区国际遴选委员会秘书长的电脑里，轻轻点击，便是全球许多城市的实践案例。

当“城市最佳实践区”规划渐渐浮出水面时，很多人频频向周汉民等人打听：什么样的城市实践，才是世博会上想展示的“最佳”？

国际遴选委员会们的最终委员们最终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根据 2010 年世博会主题内容，从城市人、城市、地球、足迹、梦想五个概念领域中选取关联较为广泛、同时又有利于展现当今世界上城市最佳实践主流的相关内容，形成 4 个展示领域，即宜居家园、可持续的城市化、历史遗产保护与利用、建成环境的科技创新。

看上去有点“概念”，不过，从已经进入“城市最佳实践区”遴选委员会视野的 70 多个城市案例里，却是再具象不过。

同样面临着能源紧张，瑞典的城市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在 1999 年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目标——“没有矿物燃料的城市”。它首先建成燃烧生物质能的热电联产工厂和集中供热站，又建设从污水中分离生物燃气的工厂，专门为汽车提供燃料。

同样为节能环保所困，但奥地利维也纳已有了好的解决之道——政府率先成为绿色产业的消费者，购买节能灯等生态产品，帮助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将“有机”的概念推广至学生家庭，鼓励市民购买生态商品。

大家特别看重主流。上海世博土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文化很是感慨。这其实也是一种信号：希望这些“最佳的示范效应能够在全全球最大化。

为保证“最佳”，组委会将通过组织者推荐，自荐及专家的方式获得城市案例，最后由国际遴选委员会评选确认后才能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亮相。

而人们也可畅想 3 年后，足不出“沪”，就能通过这些实物、实例，通过模型、多媒体、模拟生活区，来亲身体会这些“最佳”城市的先行实践。

### **一项最富悬疑的挑战**

#### **城市最佳实践区能否成为亮点**

尽管截止到 5 月 14 日，已有 136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上海世博会，不过，外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便是：城市是否有独立参展的积极性——毕竟，城市参展的“门槛”不低，除必须取得国际遴选委员会评定外，还必须自行解决费用问题。

白文华坦言，承担费用问题，是依照《国际展览公约》而定的。不过，组委会也开通了另一些“绿色通道”：无论其所在国家是否确认参加上海世博会，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团体也可以通过与城市合作的形式参与“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展示。

当然，“提高”‘城市最佳实践区’乃至上海世博会的吸引力，扩大影响力，才是吸引城市的量好办法。”

这其实涉及到另一个挑战：“实践区”本身能否成为一次极好的“最佳实践”。

在占地 15 公顷左右的展区中，要展示大约 30 座城市的实践方案，展区设计如何让城市案例能和谐相处？城市案例作为展品又该如何适应世博会展品特点？

更大的担心还在于：当“城市最佳实践区”展示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建设者与管理者，究竟能不能“内行看门道”，切实感受、借鉴到实践成果，以及他山之石，来改善并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呢？

欣慰的是，上海世博会的“城市最佳实践区”，本身也颇似一次借鉴实践的过程：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场馆比例将占到一半以上，其中，有着百年历史的火电厂南市发电厂，将改造成为主题馆分馆，名字也意味深长——“未来城市的探索”。这让人不由联想起那个备受许多专家推崇的德国卡塞尔市“闲置火车站成为文化场所”的成功案例。

“城市最佳实践区”最终有否成为世博会的一大亮点，恐怕，这才是最重要的考量标准。（《人民日报》5月15日）

## 铁路提速催生大都市圈形成

铁路第六次大面积提速后，铁道部还将推出 416 列城际快速客车，这些列车主要集中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及以郑州、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城市群，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城市群。大提速之后，更多的城际列车投入必将为城市发展带来更大的加速度。同样是京津冀经济圈中的主要城市，北京的人力资源优势远比天津丰富得多，随着城际列车的开通，北京到天津的时空距离进一步拉近，从北京到天津实现坐火车如坐公交，那么工作在天津，生活在北京，或者工作在北京，生活在天津都将成为现实，北京丰富的人力资源将更便捷地流向天津。

刘斌表示，“从目前的发展来看，今后城市行政区划的概念会模糊，大都市圈的形成将是一个必然趋势，而铁路的提速肯定会加快这种趋势的发展。”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解析北京发展动力时表示：“奥运后北京的发展后劲主要在于京津冀合作。如果没有北京周边地区的发展，北京就是一片孤岛，其长期、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圣明说，城际轨道交通网络一旦建成，对于人员和货物的流动都有推动作用，也加快了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

“大都市圈的形成其实是一种集聚经济效益的体现，过去是单一的城市，现在由于交通的发展，使得很多产业和人口集中在一起，这样不但市场需求比较多，也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以在各个城市之间进行明确的产业分工，哪些城市适合发展工业，哪些城市可以作为生态功能区，这些都会让城市的定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刘斌称。

一些专家透露，铁道部还将在 2010 年前加开部分城市的省际直达列车，这也是在为今后大都市圈的形成做进一步的准备。（《区域综合开发》总第 94 期）

## 深入合作，加速打造深港都市圈

深港合作连日来成为香港界别政协委员小组讨论关注的重点之一，委员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加强香港与深圳全面深入合作。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金紫荆星章、太平绅士刘汉铨表示，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出路，很重要一条就在于加强与内地和深圳的合作；港深都市圈可望与纽约、东京一起，成就全球三大都市圈。

### **观点1：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出路在于与内地合作**

“过去十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好，也拉动了香港的经济发展。中央政府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自由行，大大增加了香港旅游业的收入，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很多特大型国有企业，如中行、工行等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也大大拉动了香港金融业发展。”谈起香港的未来，刘汉铨指出：“香港经济要长期稳定发展，最关键是要更多地配合内地的经济发展。香港金融业发达，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又是世界重要的物流和航运中心。未来的发展中，香港应继续发挥这些优势，尤其要加强与深圳的合作，更好地带动珠三角整体发展。”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周梁淑怡则表示：“在‘一国两制’前提下，香港和内地在很多领域有大的合作空间，这些合作都是惠于国家，惠于香港的。以前香港人会认为回内地投资是帮国家，但是现在觉得是帮自己，这个趋势是必然的。”

香港太平绅士、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蔡冠深则指出：“回归这十年间，香港遇受过金融风暴，经受过非典的考验，但每一次面临困境与考验之时，中央政府都是港人的坚强后盾，这让港人对于中央的信心不断增强，寻求与内地和深圳合作的意向也不断增强。”

刘汉铨说：“此次来京开会的香港委员有百余名，基本都支持要加强港深合作的观点。”

## **观点2：港深都市圈如果加速构建可媲美纽约、东京**

在小组讨论中，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计佑铭激动地说：“港深都市圈如果加速构建，完全可与纽约、东京相媲美，成为全球三大都市圈之一。”

计佑铭在珠三角有自己的工厂，多年前就有了深港直通车牌，经常来往于两地，对深圳的情况也很熟悉。他分析说，目前两地在生活习惯上已经完全融合，在深圳和在香港居住基本没什么差别，两地同城化趋势日益明显。两地间经济融合的步伐也在加快，深圳和珠三角仍是港商在内地投资的首选地。未来如果在法制、金融、高端服务业等方面进一步接轨，将大有可为。“基于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港深都市圈将会更具活力，因为经济上的落差本来就是发展的潜力。”

“有一篇美国报道曾提及，从卫星上看下来，晚上全世界最亮的有三个点，一个是纽约，一个是东京，还有一个就是香港和深圳，两地联在一起，密不可分，非常闪亮。所以港深如果紧密合作，继续推进，完全可以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金融区、旅游中心、物流中心，从形式到实质上，都跻身全球最亮的三大都市圈。”刘汉铨蛮有信心地说。

## **观点3：深港都市圈渐行渐近**

加强深港合作。向来被深圳市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并多次在“一号文件”中提出。

2006年深圳市委“一号文件”《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中提出，加快“深港创新圈”建设；当年市政府的“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深圳金融业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深港资本市场合作，促深港资金交易便利化；去年3月，构建“深港都市圈”被写入深圳“十一五”规划；2007年市政府“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深圳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要依托香港发展高端服务业；与此同时，加强与深圳的合作也写进了香港刚刚出台的“十一五”行动纲领，并成为香港委员的普遍呼声。

种种迹象表明，在CEPA、深港“1+8”合作协议及两地政府的推动下，深港在科技、金融、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口岸通关等方面的合作正不断加强。

深港都市圈正渐行渐近。但刘汉铨仍认为：“我们现在行动的力度还不够。”他表示：“不能讲完就算了。真正要打造港深都市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回去后首先要在特区政府策略委员会里提出来，推动特区政府更多地做一些具体工作。”就金融领域，香港骏豪集团主席朱树豪亦指出，目前香港的金融业增加值是1800多亿港元，只有纽约的七分之一，即使深港两地相加，与伦教相比还是相去甚远。（《区域综合开发》总第94期）

## 深圳社会工作发力

按照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社会工作是地方政府亟须加强的一项能力。近日，深圳市率先发力，引入关注。4月17日19日，深圳市委副书记白天率学习考察团，赴港专题学习考察香港社会工作特别是社工队伍建设的经验。白天明确表示，深圳市委、市政府力争通过3-5年努力，在社会工作特别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比较大的突破。与此同时，深圳盐田区开始全面推进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试点工作。此外，深圳南山区近日面向全国招聘专业队伍，在全国尚无先例。这些信息表明，深圳的社会工作力度在加大、步伐在加快。

今年“两会”上，加快发展社会工作成为热点话题之一。来自3月23日召开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信息显示，缺乏完整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从业人员总量严重不足，从业人员总体上专业化程度较低，人才队伍建设面临体制性障碍等，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必须突破的四大瓶颈。种种迹象表明，加快推进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任务十分紧迫。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实际上，深圳较早就开始相关探索。此次在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积极探索，深圳无疑又走在了全国的前面。（《领导决策信息》部第564期）

### ● 文化思考

## 余秋雨：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和三个“不在乎”

###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对于中华文化的记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所谓横向，也就是摆脱历史顺序，从逻辑上来感悟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前些年我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巡回演讲，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华文化的长寿秘密》，这就是横向的归纳了。我主要讲了三个方面。

#### **第一，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

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



思维。比哥伦布探险早 60 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

远征即便胜利，也极大地耗损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题，牺牲了大量青壮年，也就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又让一种文化在水土不服的异地自然枯萎，更不必说，远征很可能带来报复，而任何报复都是残酷的，必以毁坏被报复者的文化作为前奏。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纳入中华文化的主体部位，他在远征途中去世，最后问鼎中原的是他的后人。元代后来也恢复科举考试，开始尊重儒家。

中华文化的不远征思维又与内耗思维连在一起。因此我曾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说，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这样。

### **第二，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

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冬天的“极端”是春天，夏天的“极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热都极端不了。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损害也是极大的，尤其是变成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性更大。这一切，都有重重的历史废墟证明。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 **第三，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

一种大文化，总是以结构形态呈现的，它要为世间带来精神秩序，自己也必须有严谨的秩序。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

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由于科举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来应试，儒家经典也就接受了一千多年无数年轻生命的滋养而得以延续。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中华文化由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

###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在乎”**

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使中华文化变得立体。

与三个“不喜欢”相对应，我选了三个“不在乎”，对中华文化的几项生态性缺憾作举例说明。

### **第一，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

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我前面说了，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小孩时能够推己及人。这当然很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

现在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广告：“为了你的家人，请你注意交通安全”；“开车两口酒，家人千行泪”等等，当然都很能打动人心，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要酒醉驾车，难道主要是为了家人不流泪吗？那些被酒醉者撞死街头的路人呢？应该知道，人性、人道具有离开朝廷和家庭的独立的终极意义。真正的大善，产生在素昧平生的公共空间。

### **第二，中华文化不在乎实证。**

中华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奸、善和恶、贵与贱，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

这个问题严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发现，在明代国家档案《明实录》中，即使是关系一国命脉的经济数字、军事数字，都严重不实。连铸造钱币这样的财经大事，该档案中所记金陵一次所铸钱币的数量，实际上整个明代两百多年间天天加班铸造都不可能完成。但是，这些重要档案的记录者、校对者、审核者、阅读者没有一个能发现，他们连发现的敏感都没有。这使黄仁宇先生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数字化管理。

由于大家对虚假缺少敏感，更缺少实证方法，因此这些年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记者横行天下，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现在，我们在经济建设、国际贸易、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先后走上了实证之路，即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化管理之路，而在文化思维上还远远没有跟上，“假大空”现象仍存在。这些年来，谣言出得最多的却是文化界。为求读者的耳目刺激而胡言乱语的现象在媒体上大量出现，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言论自由”，其实，虚假一旦自由了，真实就被扼杀了。证伪，需要有一种集体敏感和共同法则，这一切，中华文明基本上还不具备。西

方文化的现代化是从推广实证主义开始的，中华文化也应在增强实证机制，即证伪机制上，克服自身弊病，焕发新的生命。

### **第三，中华文化不在乎创新。**

政府一再强调，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于自主创新，可见中华文化的这个历史缺憾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时候了。

这一点也是从中华文化的优势中翻转过来的。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中国最受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中国最推崇的艺术家，往往是各方“无争议”，却不知道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规范的挑战，不可能“无争议”。

现在掀起“国学热”，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传承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作过度的盲目赞美，因为历史的惰性、历史的悲剧、历史的灾难也都与之有关。在这方面，鲁迅先生、胡适之先生的相关论述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在于创新。

（《领导决策信息》第 564 期）

## **● 领导科学**

### **问计于民有学“问”**

**问要诚且真。**荀子曰：“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问计于民是政府的责任和公德，要怀着强热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带着真情和诚意去问。具体说来，问计于民要具备。“三心”。一是诚心。心诚则灵，只要我们放下架子，不打“官腔”，轻车简从，深入草野”民间，遍访基层企业“问经济策”，与群众面对面交谈。心对心沟

通，群众就会说心里话，献“隆中”计。二是虚心。要以虚怀若谷的品德和甘当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胸怀接待建言的群众，以“海不辞水、山不辞土石”的精神吸纳百姓建议。三是真心。对待群众要和善迎人，亲如兄弟，情真意切，满怀热忱，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不造假作秀，不虚情假意，不搞形式主义走过场。

**问要广而众。**清代文人郑板桥有言：“读书好问，一问不得，不妨再三问，问一人不得，不妨问教十人。”读书如此。问计于民也如此，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以群众为主体。在问的过程中，不仅要听“精英”建言。征求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也要听“草根”之声，听取普通群众的建议，有时单独“问一人不得”，不妨开个座谈会“问数十人”。

问计于民要多多益善，不厌其烦；还要有“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挖掘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问要分主次。**《礼记·学记》云：“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节目：树枝交接处成结的地方）。”事有轻重缓急，问也应有先有后。战国时，齐王派使者到赵国聘问暂时代理年幼太子执政的赵威后。她还没打开书信看，便问使者：“今年收成好吗？你们的百姓好吗？齐王也好吗？”使者不高兴地质问她：“你不先问齐王如何，而是先问年成和百姓，这岂不是把微贱者放在前面而把尊贵者摆在后面了吗？”威后答道：不是这样。如果没有年成，怎么会有百姓？如果没有百姓，怎么会有国君？哪有丢开根本不问而去问细枝末节的呢？”事实证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才是“问”的要义、“问”的核心。

**问要识大体。**识大体就是围绕中心重大局，不计小事抓大事。《汉书》中记载的丙吉察牛的故事值得借鉴。汉宣帝时，宰相丙吉一次出行。途中见人斗殴死伤横于路中，他不过问，看到有人赶的牛喘着粗气，伸出舌头，却问个不停。属吏说他当问不问，不当问却去问，前后失当。他解释说：“我作为宰相，不处理小事，更不在路上过问斗殴一类小事，而现

在是春季，并不暑热，牛喘气吐舌，当是暑热所致，说明节气失调，我担心这对生灵会有所伤害。我的职责是调和阴阳，所以见到阴阳不和的现象，便要过问。”属吏认为他能识大体，十分佩服。

**问要问到底。**问计于民问到底，就是征求意见不浅尝辄止，泛泛而谈，不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而是要做到：一要问得深。就是要深入实质性命题，凡事问个为什么，问计要落到关键处，寻策要扎在根基上。二要问得实。就是要实在、实用，一事一策，操作起来有可

能性：多事多策，遇事决策有时效性。三要问得真。就是要不唯上、不唯书、敢掏尽肺腑问真话，洗耳恭听动真情。听意见，再尖锐也不逆耳烦心；问良策，再难办也不回避叫苦。

**问要勤于思。**问计于民之“问”是调查研究的一种形式，也是勤于思考的一次实践。问前，要“切问而近思”，想一想所问的问题包括哪些内容，要找什么人去问才合适，用什么形式去问才有效，对这些要做到心中有数；问时，要想一想怎样才能使被问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怎样才能使所问的问点得到满意的答复，并能铭记于心；

问后，要想一想如何集思广益，条分缕析，去粗存精。如何把建设性良策化为决策，把合理化建议变为措施，做到践于行。（《领导科学》2007年第四期）

## 重庆“安保互动”为安全生产筑起坚固防线

近年来，重庆市通过政府的引导，将商业保险引入安全生产领域，在高危、高风险行业推行雇主、承运人和公众责任险，探索建立安全生产与保险良性互动机制，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2007年4月4日至4月6日，由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组成的调研组，对重庆市安实施安保互动的背景、具体方案、操作程序、现状和实施效果、存在的问题以及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调研。

重庆市曾是全国重灾区域，安全生产面临的压力和挑战相对其他省市更加突出。2004年初，重庆市政府开始尝试安全生产与商业保险的“联姻”，并成立了重庆市“安保互动”推进办公室。从2005年8月开始，重庆市安监局、重庆保监局在前期一研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等4家保险公司，在永川、涪陵等9个区县分批开展了“安保互动”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工作已在永川、涪陵、合川等7个区县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共有煤矿、非煤矿、危化、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企生571户（不含烟花爆竹季节性经营户1087户），12066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了安全责任保险（雇主责任险）协议，签约保费604.43万元，承保金额12.2亿元。

鉴于近年来我国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相关领域专家纷纷呼吁把保险机制引入安全生产领域，利用商业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职能，促进企业的安全生产。然而，推行责任保险面临一个艰难困境，那就是保险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不愿承保高危行业责任险或以抬高费用为承保条件。而对于企业来说，分散投保，保险费较高，企业也不愿意承担或承担不

起。重庆市。“安保互动”新机制，则把这个两难抉择变成了双赢。与目前其他省市开展安全责任险以暗示性的强制性投保为主的做法相比，重庆市政府在“安保互动”中引进了美国在安全责任险方面的操作手法。那就是，设立 2 个平台配合“安保互动”的推进。一个是安全投资基金公司，该基金的资金用于投保企业的安全设施建设，以及雇佣专家对投保企业安全情况进行诊治。另外一个平台是安全评价咨询公司，为企业安全情况诊治提供专家。专家认为，“安保互动”最显著的功能是能够化解事故风险，减轻政府和企业负担。（《领导决策信息》部第 564 期）

## 全球开发新能源动向

在开发新能源问题上，过去流行一种自由经济理论支持的看法：能源制的转化是一个市场进程，可以靠价格机制的引导完成。即，石油资源一旦开始枯竭，油价就会作出反应，新能源的吸引力因而提高，成为投资开发的新目标。而政府的介入，只能干扰这一进程的自然发展，增加能源体

制转换的成本。

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石油价格在一定时期的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

未必能反映石油供应的长期走势。尤其是在供应趋紧初期，油价更可能呈波浪起伏，而非直线上升。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种价格运作发出的信息是混乱的。实际情况是，石油价格的短期回落很容易动摇投资者的热情。此外，投机因素和泡沫的存在，也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关注度往往不稳定，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政府不仅要有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意向和规划，还需尽早着手实的

有力的推动措施。原因之一是新能源的发展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到目前为止，几乎每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都面临重大技术障碍，其本身也存在不易克服的缺陷。有关研发工作取得的成果离真正的技术成熟和大规模工业应用仍有距离。尽早着手开发，就意味着能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多方面的探索，

试验不同解决方案，使能源体制的转换尽可能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降低变化的代价，减小其带来的震动和冲击。

另一个原因是，任何一种新能源的推广使用，甚至过渡性的能源转换，

都涉及配套设施方面的巨大资源投入，需要从一开始就纳入通盘规划。发展中国家其实更应尽早将新能源经济的需要纳入基础建设规划：它们尚未建立起石油经济所需的全套基础设施，因此更有余地及早进行调整，减小投资的浪费，在基础建设方面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

目前，提供财政“补贴”是各国政府扶助可再生能源企业的主要手段。

这种支持包括向新能源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资助和税收减免，以及给产品的购买者提供消费补贴和退税等方面的刺激，鼓励更多民众和企业尝试新能源产品。

补贴的主要作用在于减小新、旧能源产品在成本和价格方面的差距，

从而削减新能源产品进入市场和扩大市场份额的主要障碍。这对于帮助新能源企业扩大生产，建立支撑新能源工业发展所需的市场规模，是重要的。在推动新能源发展方面，各国都高度重视推动技术突破。这很有道理：推广新能源的关键在于解决有关能源的使用效率和成本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创新。’

总之，为了更有效地推动新能源的开发，包括更有效地推动技术创新，

需要有更加平衡的激励政策和高明的政策框架，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鼓励更多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参与建设明天的能源体制。（《领导决策参考》总第 88 期）